

鼎革與遺民：劉聲木 (1878~1959) 的易代論述*

莊郁麟**

遺民藉由閱讀、研究與書寫，不僅建立獨特的記憶，亦形成一套評判歷史的標準。劉聲木認為，程朱因有助於國家綱常的維持，故處正端；陽明學因提倡「絕綱常」，則處負端。正負兩者傾軋，盛、季二世因此循環，而《四庫提要》與程朱同為一脈，所以最為重要。《四庫提要》不僅說明蒐羅書籍經過與版本，亦會多加評斷書籍與作者。不過，不符官方意志的書籍，亦可能被清廷禁燬。對此，劉聲木並未多加批判，反倒認為士人應「自我檢視」。然而，儘管清廷治理有方，但因綱常蠱害的流毒並未根絕，戊戌維新分子又繼承此脈，所以清朝仍邁向衰亡。那麼，處於朝代更迭之際的士人，又該如何自處？因此，劉聲木藉由評論歷史上易代人物的出處，除了以為殷鑑之外，亦抒發己志。

關鍵詞：劉聲木、遺民、靖難、書籍禁燬、《四庫提要》

* 本文經兩位匿名審查者、林麗月教授、吳志鏗教授，以及「晚清社會史研討」修課同學斧正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*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。

一、前言

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出版的《清史稿》，為最後一部傳統官修史書，不僅代表清朝的滅亡，亦象徵著舊時代的消逝。雖然袁世凱（1859-1916）成立清史館的初衷，在於籠絡人心、避免罵名，但對參與修史的清遺民來說，除了可以解決一時物質生活窘境之外，亦可重建、守護前朝記憶，藉此做最後的盡忠，向清朝道別，進一步「以史為鑑」，找尋易代之際安身的方式，從中獲得生存力量。

修纂《清史稿》時，正遭逢世界亙古未有之變局，不僅中國「國變」，世界各國帝王亦紛紛退位。與《清史稿》總纂繆荃孫（1844-1919）交好的劉聲木，並無欣喜之情，並以漢武帝（157B.C.-87B.C.，141B.C.-87B.C.在位）賜風聲木枝的故事，¹改名為「劉聲木」，以「十枝」為字，以此自指身患「黍離相思」。²

劉聲木的《萇楚齋隨筆、續筆、三筆、四筆、五筆》不僅記載許多晚清事蹟，更對時事有所評論，可藉此瞭解劉聲木獨特的心態與記憶。學者林志宏指出，劉聲木認為綱常崩壞、科舉不興，是清室崩潰之因。而劉氏閱讀引用的來源有三：四庫提要及書目、

¹ 典故出自漢·郭憲，《漢武洞冥記》：「太初二年，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，得聲風木十枝獻帝。長九尺，大如指，此木臨因桓之水，則《禹貢》所謂因桓是也。其源出甜波，樹上有紫鶯黃鵲集其間，實如油麻，風吹枝如玉聲，因以為名。帝以枝遍賜尊臣，臣有凶者，枝則汗；臣有死者，枝則折。昔，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，枝竟未汗；偃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，枝竟未一折。帝乃以枝問朔，朔曰：『臣已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，豈汗折而已哉？』」里語曰：『年未半，枝不汗。此木五千年一濕，萬歲不枯。』」此據漢·郭憲，《漢武洞冥記》（明顧氏文房小說本），卷2，頁8b-9a。

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萇楚齋隨筆、續筆、三筆、四筆、五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，三筆卷4，〈聲木自取齋名〉，頁545-546。以下簡稱為《萇楚齋隨筆》、《萇楚齋續筆》等。

時人文集與報紙，不過其非囫圇引用，而是有所選擇。³另外，吳志鏗指出，劉聲木認為清朝衰亡自光緒（1871-1917，1875-1908 在位）親政始，且認為一連串改革是主因。現今學者檢討經濟、列強、吏治及滿漢畛域等層面，皆被選擇性書寫、詮釋或迴護：劉氏筆下的慈禧太后（1835-1908），是一位比光緒皇帝睿智、穩重的統治者。但慈禧引起的事件及不合時宜的政策，如義和團、太平桶，或是被忽略，或是被劉氏解釋為德政。⁴不過，兩文皆指出劉聲木認為帝制大勢已去，故不參與復辟。

上述兩文以思想與記憶的研究角度，分析劉聲木於辛亥以後的處境與心態，為目前清遺民研究建立良好的基礎。儘管劉聲木經歷西風東漸、中國政體轉變，但其仍以「舊思想」看待此際的變化及自身處境。換句話說，劉聲木著作內容涉及議題，或可與明清易代士人參照。

明清易代士人關於「生死出處」的論述，與宋代以來對於「忠」的強調相關。宋代士人鑑於五代不斷更替，以及君主權威提高，因此對忠的需求更為強烈。⁵歐陽脩《新五代史》為了表彰殉國者，另立〈死節傳〉、〈死事傳〉，助長「臨難死節」的流行。明代永樂年間，朝廷頒訂一系列理學著作，使忠孝節義思想擴及士農工商。⁶時至明代中期，士人著作涉及內容較前代多樣，但未沖淡

³ 林志宏，〈清遺民的心態與處境：以劉聲木《莢楚齋隨筆》為例〉，《東吳大學歷史學報》，9（臺北：2001.3），頁183-218。

⁴ 吳志鏗，〈清遺民的晚清記憶——劉聲木的個案研究〉，文收李國祁主編，《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5），頁315-353。

⁵ 劉紀曜，〈公與私——忠的倫理內涵〉，文收劉岱總主編，《中國文化新論·思想篇二·天道與人道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2），頁171-208。

⁶ 何冠彪，《生與死：明季士大夫的抉擇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7），頁5。

「忠」的相關論述。

何冠彪的研究指出，明清易代士人對忠節的重視，除了反映在大量的殉國人數之外，亦展現於「生死論」。有些士人見國勢危殆，無奈獨木難支，只得一死報國。然而，殉國者中，卻不乏懼怕受辱，甚至逃避責任。因此，士人進一步分析各種殉國情況。若要做出抉擇，必須衡量「死」的必要性為何？什麼樣的情況可以「死」？士人殉國的原因繁多，或因戰事，或基於道德責任，或迫於清初的高壓政策。不論原因為何，「殞身」並非唯一的選擇。但所謂「生難死易」，又該如何活才能合於「道」？⁷另外，趙園指出，明遺民也因為政權交替，造成認同混亂。他們藉由「遺民」概念的界定，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「我是誰」、「我為何子遺」。也藉由研究易代歷史，找尋可供借鑑的人物，並確立自我生存的意義。⁸

明清易代又牽涉種族問題，使得明遺民立場更加複雜。何冠彪藉由顧炎武（1613-1682）、黃宗羲（1610-1695）、王夫之（1619-1692）等人，歸納明遺民的立場有兩類：種族主義、文化主義。種族主義者認為應堅守「夷夏之防」，故批評被元廷禮聘的儒者（如江漢學派）有違《春秋》大義；文化主義者認為，出仕外族政權的儒者值得被推崇，因為他們致力傳承漢文化。⁹然而，明遺民立場的錯綜，似乎未見於劉聲木的著作。在「忠」與「種族」之間，其顯然側重前者。

劉聲木抄錄許多歷代變亂士人的出處，似乎是找尋自處之道

⁷ 何冠彪，《生與死：明季士大夫的抉擇》。

⁸ 趙園，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二版），頁217-238。

⁹ 何冠彪，〈論明遺民之出處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91），頁53-124。

的過程。其以《詩經·隰有萋楚》¹⁰為書齋名，正是自身心境與處境的展現：萋楚¹¹生於低濕處，其枝葉花果柔軟婀娜舒展，而詩人羨慕其無知無家無室。《詩經·隰有萋楚》約成於檜國亡時，人民不堪其苦，希望能如「萋楚」無知無憂又無累。劉聲木認為，無知、家室意有所指。男子有家、女子有室，若皆羨萋楚，或若皆羨慕無知，國焉能不亡？¹²如今，「國變」之際，清帝退位，「無知」不僅令人羨慕，亦令人厭惡：現實景況不堪入目，不如無知而生活無憂。但季世的到來，卻又因無知又無所作為而起。自身處境，就如南宋張炎（1248-1320），又或如歷代遺民，遭逢國變而潛跡，徜徉於書史之中。¹³

遺民藉由閱讀、研究與書寫，不僅建立獨特的記憶，亦形成一套評判歷史的標準。劉聲木閱讀範圍擴及《四庫提要》、遺民論著及報刊等，且認為戊戌害國、害綱常。所以，本文首先探討劉聲木為何較重視《四庫提要》，及其認為書籍禁燬具有何種效用。儘管清朝治理有方，他仍認為綱常最終仍敗壞，那麼除了國之衰亡始自光緒親政之外，綱常蠹害又源自何時？另外，歷史上哪些人出處合乎、有違倫常，並能以為殷鑑？

¹⁰ 「隰有萋楚，猗猗其枝。天之沃沃，樂子之無知。隰有萋楚，猗猗其華。天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家。隰有萋楚，猗猗其實。天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室。」據朱熹，《詩集傳》（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），卷7，頁11b，。

¹¹ 萋楚：「金羊桃也，子如小麥，亦似桃，猗猗柔順也。」見朱熹，《詩集傳》，卷7，頁11b。

¹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萋楚齋五筆》，卷1，〈論詩經萋楚章室家二字〉，頁895。

¹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萋楚齋三筆》，卷4，〈自比南宋張炎〉，頁547-548。

二、崇文與焚書：《四庫提要》及書籍禁燬

《四庫全書》編纂最初目的在於「稽古右文」，後來發展為「寓禁於徵」，使得其意義不單是「圖書總輯」，更是國家藉由文化統制的手段，塑造「政治正確」的論述。¹⁴《四庫全書》曾抄七部，至民國時期僅剩四部，但剩餘的四部該如何存續於「新國家」？民國建立後的《四庫全書》，不僅是知識分子、研究人員眼中的「材料」，更是民族的精髓，因此需要透過出版保存、宣傳「我國」文化。它已脫離原本帝國統治的色彩，轉變為各方勢力競逐的文化資產。¹⁵不過，在輿論關注《四庫全書》「交由誰出版」、「流落至何方」的同時，劉聲木則藉《四庫提要》回顧清朝盛世。

劉聲木認為，儘管《四庫全書》未必「全」，與私家藏書動輒三四十萬卷仍相形見绌，¹⁶但清朝願動員國家力量編輯，即是崇儒右文的表現。¹⁷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經史子集，是由紀昀（1724-1805）細心查核分類。有些書名相同，但分類不同，即可知其內容性質相異，此即《四庫》的「微言大義」，足以「昭示萬世」，而能如此則歸功於紀昀「細心檢查，苦心審定」。得知分類，購書、讀書才有頭緒，因此要有《四庫簡明目錄》作為搜查協助工具。¹⁸

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每套書前皆有「提要」做為簡評，後又將「提要」合輯成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。劉聲木大致贊同張之洞

¹⁴ 王汎森，〈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文獻中「自我壓抑」的現象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年二版），頁413-415。

¹⁵ 林志宏，〈舊文物，新認同——《四庫全書》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77（臺北：2012.9），頁61-99。

¹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莒楚齋續筆》，卷1，〈私家藏書多於四庫〉，頁243。

¹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莒楚齋隨筆》，卷6，〈四庫著錄總數〉，頁132。

¹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莒楚齋續筆》，卷9，〈四庫分部美善〉，頁427。

（1837-1909）之論，認為《四庫提要》是「讀群書之門徑」，不過並未認為《目錄》完全由《提要》摘要而成，仍有相異之處，所以認為《目錄》仍有仔細研究的必要，因此桌前擺放《輶軒語》、《書目答問》、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三書，而未放《四庫提要》。看似《四庫提要》重要性不如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，實際上不見得如此。或許正因為對於《提要》的熟悉，發現兩者頗多互異之處，所以欲將《目錄》置於案頭以便研究。而且對於劉聲木的書寫來說，《提要》供給較多可利用的資源，因為《目錄》的文字僅有《提要》的「貳拾分中之壹分」。¹⁹

劉聲木認為，《四庫提要》所指出的陸王弊端是宗社淪亡的原因，他說：

講學之風，至明季而極盛，亦至明季而極弊。姚江一派，自王畿傳周汝登，汝登傳陶望齡、陶奭齡，無不提唱禪機，恣為高論。奭齡至以因果立說，全失儒家之本旨。宗周雖源出良知，而能以慎獨為宗，以敦行為本，臨沒猶以誠敬誨弟子，其學問特為篤實。東林一派，始以務為名高，繼乃釀成朋黨，小人君子，雜糅難分，門戶之禍，延及朝廷，馴至於宗社淪亡，勢猶未已。²⁰

在十六世紀中期，王陽明（1472-1529）於江西，即有地方講會活動，後來持續擴展，並成為陽明學最重要的傳播組織。儘管晚明學術有三教融合之勢，文人議論也大抵開放，但亦有排斥混染

¹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莚楚齋五筆》，卷9，〈論書目分類〉，頁1075-1076。

²⁰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收入清·紀昀等總纂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至5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），卷172，〈劉蕺山集〉，頁58a-59a。

禪風的王畿之學者，其中包含東林學者。²¹而以程朱為主的《四庫提要》，則「倡禪」與「因果」偏離儒家初衷，後續更影響門戶對立，禍及朝廷。據此，劉聲木認為《四庫提要》駁斥公允，不需辨朱陸異同，優劣已顯見。程朱學術本平實無弊，故足以昭示百代。²²這也是《四庫提要》推崇程朱的原因，劉聲木論曰：

程朱與陸王二派，若水火之不相容，習程朱者無不攻陸王，習陸王者亦然。紀文達公昀為昭代大儒，學問淵雅，志識高卓，未聞以程朱、陸王之學自囿也。其撰《四庫提要》，於程朱之學，雖有微詞，不過不服膺而已，未至於如陸王之學，則攻擊不遺餘力，雖未明言禁人學習，極言其流弊所至，不知底止。可見公道自在人心，非區區口舌所能強爭也。²³

陸王、程朱水火不容，但優劣顯而易見。藉紀昀證明自身看法允當的原因，除了劉聲木認為其就事論事之外，亦認為其見識超群：雖生前西學東漸的情況不如晚清，但對「歐羅巴」技藝亦認識甚深，並得出相似於「中體西用」的看法。²⁴即便紀昀不服膺程朱，但其「不混繼、妄名分」，行事操守仍以綱常為準。²⁵所以無論《四庫提要》字句是否全出於紀昀，至少是由此種學識皆博者進行「總審查」，故評論客觀。而且，紀昀為不服膺程朱者，亦

²¹ 呂妙芬，〈晚明江右陽明學者的地域認同與講學風格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56（臺北：2002.5），頁310。

²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〈莢楚齋三筆〉，卷8，〈四庫提要斥陽明學〉，頁647。

²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〈莢楚齋續筆〉，卷1，〈四庫提要推重程朱〉，頁232。

²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〈莢楚齋隨筆〉，卷2，〈論紀昀〉，頁43。

²⁵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〈莢楚齋五筆〉，卷7，〈紀昀論繼配不能稱繼室〉，頁1022。

認為陸王不如程朱，可見此為不需辯論的公道。

《四庫提要》不僅是「閱讀的途徑」，其內容值得信賴，即可作為論證，甚至更為劉聲木批評時局的基礎。其中，四庫館臣對於王安石（1021-1086）的批評即是一例。據四庫所收宋代沈與求（1086-1137）《龜溪集》之提要載：

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曰：「與求嘗奏王安石之罪，大者在於取揚雄、馮道。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。喪亂之際，甘心從偽，無仗節死義之風，實安石倡之。此論前未之及也」云云。考熙寧以逮政和，王、蔡諸人以權勢奔走天下。誅鋤善類，引掖宵人。其夤緣以苟富貴者，本無廉恥之心，又安能望以名節之事！其偷生賣國，實積漸使然，不必盡由於推獎揚雄、表章馮道。與求此奏，亦事後推索之詞。然其說主持風教，振刷綱常，要不可不謂之偉論也。²⁶

《四庫提要》將王安石視為「以權勢奔走天下」又「偷生賣國」的小人，是綱常風教的禍害。劉聲木將此段摘抄至《菴楚齋隨筆》，並進一步批評：

我朝之易社為屋，其情形與北宋極相類。自引用夫己氏後，已覺綱紀蕩然，倫常盡變，不待宣統辛亥以後，早已潛移默運於此，名教掃地盡矣。²⁷

「夫己氏」（暗諷袁世凱）如王安石之徒，朝廷進用後更使綱常崩潰，正如戊戌變法後的晚清。因此，劉聲木進一步申論：

²⁶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157，〈龜溪集〉頁1b-2a。

²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北宋王安石亂天下〉，頁81。

王安石尊揚雄為聖人，從祀孔子廟廷而紹述，餘黨又尊王安石，入祀孔廟，致有靖康之禍，二帝蒙塵。明季尊魏忠賢為聖人，徧祀天下文廟，而明社為墟。禮義廉恥先亡，國未有不亡者也。²⁸

劉聲木認為，王安石尊揚雄（53 B.C.-18 A.D.），餘黨又尊王安石，宋哲宗（1077-1100，1085-1100在位）又藉言紹述而復行新政，²⁹以致靖康之禍，就如魏忠賢（1568-1627）於明代被尊為聖人導致明亡。不過，北宋新黨執政時，西北經營大有斬獲，並收吐蕃入版圖，並非毫無建樹。至於徽欽二帝遭俘，看似河北邊防承平日久而疲弱，不過金兵仍顧忌秦隴之師，緩戰、結盟仍有可為。然而，在宋兵夜襲失敗、雙方和談後，欽宗（1100-1156，1126-1127在位）自悔盟約，戰端再起。此時宋勁旅已潰，汴京虛弱，种師道（1051-1126）勸欽宗避敵從長計議，但主戰派仍強留。³⁰換句話說，除了王安石如「某人」之外，宋欽宗就如識人不明又未諳情勢的光緒帝。或許這也是何以劉聲木並未再查核為什麼王安石為「奸人」，而是直接接受《四庫提要》的論斷。

對他來說，《四庫提要》是提供批判性書寫的資源，用以抒發對於現世的不滿，而總纂見識超群，使得論點更具說服力。不過，另外一方面，四庫收書可謂「圖書總檢查」，清政府藉此標示「好書」、「壞書」。《提要》不僅說明收藏經過與版本，亦會多加評斷

²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論揚雄等人〉，頁72。

²⁹ 脫脫等編，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，中華書局點校本），卷471，〈姦臣一·章惇〉，頁13711。

³⁰ 廖隆盛，〈從澶淵之盟對北宋後期軍政的影響看靖康之難發生的原因〉，文收氏著，《國策貿易戰爭——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），頁207-241。

書籍與作者，可謂官方意志的宣揚。

「壞書」、「壞人」等不合官方意志的書籍，除了如上述藉由《提要》批評之外，更有可能被禁燬。官方禁燬書籍與文字獄所形塑的「壓力」，隨著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與蒐羅而施加於民間，造成「自我壓抑」。³¹而劉聲木並未批判清朝的文字統治，反倒認為文人應「自我檢視」，他說：

古人自燬其詩文稿者有之，若已刊有成書，仍復燬之者，實為千古所罕有。國朝閩縣周櫟園侍郎亮工，生平撰述宏富，久已陸續刊行。忽於卒之前一年，歲逢辛亥，一夕盡取《賴古堂文集》、《詩集》、《印人傳》、《讀畫錄》、《閩小記》、《字觸》、《尺牘》、《書影》等百餘種自撰書板，悉行自燬。此見於雍正三年重刊《書影》其子在延序中，可稱怪事。若以為可傳耶，則不當燬，若以為不可傳耶，則不當刊。豈撰述百餘種中，竟無一二可以傳世之書，必盡燬之而後快，此何意也？³²

劉聲木批評，如果文字有違礙，就不該刊刻出版。但周亮工（1612-1672）身分特殊，可能因有自覺而先行燬板。周亮工為明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進士，李自成入北京時，隨明福王至江寧。順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兵南下，周亮工謁軍門降，授兩淮鹽運使，後遷任左副都御史。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疏陳閩海用兵時機恰當，並建議停撫進剿鄭成功。不久後，福建巡撫截獲鄭芝龍、鄭鴻逵與鄭成

³¹ 王汎森，〈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文獻中「自我壓抑」的現象〉，頁395-502。

³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續筆》，卷7，〈周亮工自燬撰述板〉，頁390-391。

功私書，鄭芝龍因此伏誅。同年，周亮工遷戶部右侍郎。

然而，周亮工仕途並非一路坦順。順治四年（1647）任職福建按察使時，曾奏請將馬際昌、王國弼及餘黨等人定罪，同年諸人亡於獄中。五月，馬際昌家屬辯冤再審。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周亮工被誣告入獄，不過因罪證不足，且曾砲擊海賊，守閩有功，康熙元年（1662）起任山東青州海防道，五年（1666）調江南江安糧道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因縱役侵款被革職處絞，隔年獲赦免。而身後並未獲得好評，乾隆編纂《欽定國史貳臣表傳》時，將周亮工列於錢謙益（1582-1664）之前，同列乙編。³³

試想，清初文字獄約一百七十件，甚至引發大規模整肅，人心豈能不惴惴？³⁴此時，周亮工或許考慮宦海浮沈無常，擔憂書板可能拖累族裔，故先「自我審查」，逕行燬板。而清廷確實欲燬其著作，據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記載：

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

查四庫書內應行銷燬各書……，謹開具清單於各書頁面黏簽，送請銷燬。

謹奏。附清單：

《讀畫錄》。此書係周亮工撰。因詩內有「人皆漢魏上，花亦義熙餘」，語涉違礙，經文源閣詳校簽出，奏請銷燬，並將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。此係文淵閣繕進之本，其違礙語句，已經原辦之總校挖改。全書應燬。

³³ 王鍾翰校，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卷79，〈周亮工〉，頁6574-6575。

³⁴ 王汎森，〈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文獻中「自我壓抑」的現象〉，頁399-402。

《閩小記》。此係周亮工撰。應燬。

《印人傳》。此書係周亮工撰。應燬。³⁵

劉聲木所指出的周亮工著作《印人傳》、《讀畫錄》、《閩小記》，四庫曾收，但後又被奏請銷燬。可知此三部書雖可能被周亮工本人燬板，坊間已有流傳，故四庫曾收。其中《讀畫錄》有清嘉慶四年（1799）桐川顧氏「讀畫齋叢書」本，但劉聲木不得而知。

至於周亮工其他著作的動向，劉聲木說：

厥後《賴古堂文集》三十卷，當塗令寇公有重刊本，《詩集》十卷，江都文學汪子有重刊本，《閩小記》等書，其子西田燕客有重刊本，《書影》十卷，張敬思有重刊本。於是侍郎生平撰述，其瑩瑩之大者，皆有重刊本。其它撰述，存而不論可矣。³⁶

他指出《賴古堂文集》、《詩集》、《閩小記》皆有刊本，又以《閩小記》在四庫纂修過程中奏燬。然而，據檔案記載，僅知《閩小記》遭燬，是因「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」，晚清革命份子也並未使周亮工著作「復出」。劉聲木若得知此書仍存重刊本，有可能親自翻閱，但未見違礙，故對於「必盡燬之而後快」感到困惑。

遭禁燬的書籍不一定會完全銷聲匿跡。除了剗改書板，亦可能藉抄本躲避官方查緝。這些書籍隨著晚清革命風潮「復出」，而每一次復出，都是一次「再製造」，就如《揚州十日記》、《嘉定屠

³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（下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），1319，〈軍機大臣奏查四庫全書內應行撤出銷燬各書情形片（附清單一）〉，頁2143-2145。

³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續筆》，卷7，〈周亮工自燬撰述板〉，頁391。

城記略》等。³⁷關於潛藏「種族之見」的禁書，劉聲木說：

自光緒末造，種族革命之說興，一人倡之，千百人和之，遂至釀成宣統辛亥之變，而清社易屋。論者遂謂種族之見創自泰西，流被東瀛，四十年內，其說盛行於時。不知此種心理，其淵源早發見於三四百年以前，是當時之人，早已有此心理。其與近世相應者，蓋亦有故。我朝入關之後，禁忌各書，檢查毀滅尤甚嚴，難保無流入東瀛者。東瀛得以因之鼓蕩中國人心，助成其事。³⁸

據劉聲木觀察，時人認為光緒末年的「種族之見」，是由西洋創發，經日本而入中國，也有可能是在清初以禁書為載體，傳至日本而又回傳中國，使革命份子得以「顛覆國家」。³⁹然而，晚清士論不止於種族革命，更包含中國政體的反省。換句話說，劉聲木以「種族革命」解釋清廷覆滅，而未能申論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，可見其思想的侷限。

劉聲木閱讀《四庫提要》，發現「種族之見」可溯源至明代正德年間出版的《宋史質》。《宋史質》是明正德進士王洙（1485-？）以《宋史》為基礎寫成，其中將遼金視為外國，上溯明太祖三代

³⁷ 王汎森，〈道、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——禁書復出及其意義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，頁605-646。

³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續筆》，卷5，〈明王洙宋史質〉，頁349-350。

³⁹ 清廷禁燬書籍所造成的社會壓力，使得書籍流傳日本、朝鮮。部分書籍亦可能藉由鈔本、剞改書版等方式，藏匿於民間。劉聲木論禁書流傳至日本，據目前日本及其他國家收藏鈔本情況，可知並非無稽之談，但未能知其閱讀何種促成種族之見的書籍。實際上，關於書籍禁燬與流傳，仍有賴諸多個案研究，筆者擬另闢文章探討。而近年最具影響力之研究成果，詳參：王汎森，〈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文獻中「自我壓抑」的現象〉、〈道、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——禁書復出及其意義〉，頁395-502、605-646。

祖取代元年號，並仿「《春秋》書公在乾侯，《綱目》書帝在房州之例」，記載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後明太祖動向。雖然革去「外族政權」的政統，但清廷並未禁燬之。據《四庫提要》載：

自有史籍以來，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。其書可焚，其版可斧，其目本不宜存。然自明以來，印本已多，恐其或存於世，熒無識者之聽，為世道人心之害，故辭而闕之，俾人人知此書為狂吠，庶邪說不至於誣民焉。⁴⁰

《四庫提要》藉此直斥「不合理」之處，使眾人不被邪說「誤導」。也就是說，清廷的圖書統制不僅採取禁燬書版的方式，也透過直接批駁來昭示何謂「異端」。不過，除了印本已多，難以徹底清除之外，劉聲木亦有其它推想：

此等議論識見，實千古所罕見罕聞，不謂王洙竟公然以之改削史書，刊行於世。王洙一人之私見，決不敢如此。想當時輿論已有此說，王洙更推波助瀾，著書立說，以申明之，亦可異矣。⁴¹

雖然並不清楚王洙為何特地公然改史刊行，但可見摒除遼金元正統的「種族」之說有輿論支持，非一人私見。實際上，由於「土木之變」激起官方與民間的存亡意識，使得夷夏之防與正統觀念有所轉變。由明朝官方修纂並於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成書的《續資治通鑑綱目》，將遼夏排除在中國正統之外而不得紀元，金元則以

⁴⁰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50，〈宋史質〉，頁41a-42a。

⁴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續筆》，卷5，〈明王洙宋史質〉，頁350。

「得中原」為分界，此後註記於宋統紀年之下。後來，曾參與《續綱目》修纂的丘濬（1421-1495），更採取嚴格的華夷之辨，否定元朝的正統。⁴²而王洙因為元修《宋史》未明確彰顯宋代正統，以及出自對於朝政的關心，故藉宋史論時局，書成《宋史質》。⁴³

《宋史質》牽涉種族敏感議題，足以動搖清朝正統，而劉聲木此時不再疾呼「有國家者，宜有以深思熟慮，早誅其人，火其書，絕其源」。一方面是因為《四庫提要》已有駁斥，禁燬則失去斧正天下的機會；另一方面，可能因為對劉聲木來說，清廷所堅持的程朱綱常相對重要，且民國取自清室已為事實，不需質疑前清正統。

因此，有害人倫的著作，如程羽文《鴛鴦牒》提倡違反父母之命的自由戀愛，以及王暉《丹麓雜著十種》、《看花述異記》直書情慾，劉聲木則論其「倡亂導淫，有司當誅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以保存名教」。⁴⁴此外，他更認為造成「學術之禍」者需禁燬，論曰：

明季生屠隆、李贄、桑悅、祝允明等非聖侮法之人，天下靡然從風，其流毒甚於張李二流寇。流寇禍天下，不過一時。學術之禍天下，其影響於人心風俗者，至捷至大，至久至遠。有國家者，宜有以深思熟慮，早誅其人，火其書，絕其源，無使肆其流毒也。⁴⁵

⁴² 傅范維，〈從〈諭中原檄〉的傳鈔看明代華夷正統觀的轉變〉，《明代研究》，22（臺北：2014.6），頁59-67。

⁴³ 王德毅，〈由宋史質談到明朝人的宋史觀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（臺北：1977.4），頁221-234。

⁴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莚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論程羽文鴛鴦牒〉，頁71。

⁴⁵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莚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論揚雄等人〉，頁72。

劉氏認為，此類亡國言論，人可誅、書可燬，不需為之翻案。學術之禍影響天下風俗，乃至國家覆滅。在位者若有深思熟慮，應當早日禁絕，以免流毒後世。綱常秩序是道德底線，逾此則有害社稷。換句話說，軍事、經濟或政治等問題，遠不如綱常重要。

劉聲木認為，綱常之中又以程朱講求的「忠」為要，即是家之所以不散、國之所以不頹的根本。忠節有助維持綱常，若不重此道，則將如清末季世般，人倫潰散以致清帝退位。⁴⁶若不除去侵害程朱道理的「蛀蟲」，支持家國的秩序會被腐蝕殆盡。

程朱有助於護持綱常，綱常又維繫著國與家上下尊卑秩序。與此對立者，則是陸王。雖紀昀未執一端，但亦認為綱常為重，且對陸王同樣「深惡痛絕」。因此劉聲木認為《四庫提要》與程朱同為一脈，評論公允且不需質疑。若書籍內容對綱常有害，《四庫提要》則加以駁斥。而此類書籍可能「顛覆國家」，故劉聲木認為應盡早去除以絕後患。但部分書籍並不涉及違礙卻被禁燬，或者因撰者另有考量而自燬書板，劉聲木則不批判政府舉措失當，反倒認為士人應當自行避免違礙內容。總而言之，書籍禁燬被劉聲木視為維護綱常的正當手段。

三、靖難遺禍：敗壞綱常的根源

作為清朝統治意識傳播媒介的《四庫提要》，其專制色彩在中華民國成立後褪去。此際知識分子價值觀念轉變，不再以《四庫提要》為自我審視的標準。而劉聲木則與此風潮相對，依然認為《四庫提要》傳遞的程朱綱常是人世經緯，且更可藉焚書燬板除去陽明蠹害。

⁴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續筆》，卷8，〈李慈銘言程朱有功名教〉，頁399。

可惜的是，儘管清朝致力於維持程朱之道，國勢仍走向衰頹，終至滅亡。劉聲木認為，其原因在於陽明「流毒」源遠流長，並未根絕。所以，他藉由探討明清兩代世道的盛衰變化，找尋遺害綱常的源頭。

據他觀察，道光、咸豐、同治等朝，仍有盛世光景。⁴⁷但光緒朝之後，廉恥淪喪，達官顯貴自開店鋪斂財，更引出趨炎附勢之徒。⁴⁸1895年甲午戰爭，清國戰敗，光緒皇帝與維新派士大夫欲變法圖強，後來更推行「戊戌新政」，劉聲木反倒認為「國將亡，必多制」。⁴⁹舊制如國粹，若不存則亂綱常，就如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，所用之人為矯俗干名之輩，使得綱常名教顛覆潰敗。⁵⁰而近時亦起用小人推行改制，顯得光緒毫無識人之明。

另外，甲午戰爭的失敗，劉聲木認為是光緒昧於情勢，不知日本今非昔比，⁵¹且此時日本上下一心，「尊君愛國」之情昂揚。⁵²儘管日本維新亦有體制上改革，但仍重君臣綱常。只要堅持上下尊卑倫常，即可走向富強，因此劉聲木摘抄1924年上海《申報》載張作霖（1875-1928）對京直紳商的演講語，並對此論道：

此數語，真當今學堂之藥石，家庭之龜鑒也。不謂生茲亂世，綠林魁首，猶懂得正經道理，所言無悖於聖賢若此。

⁴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三筆》，卷6，〈承平士大夫奢侈〉，頁587。

⁴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五筆》，卷4，〈咸豐時士大夫敦品勵學〉，頁969。

⁴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續筆》，卷2，〈胡思敬論亡國由於改制〉，頁260。

⁵⁰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北宋王安石亂天下〉，頁81。

⁵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四筆》，卷7，〈論光緒甲午開釁緣起〉，頁821-822。

⁵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續筆》，卷3，〈日本尊君愛國〉，頁298-299。

其言行若有與此相反者，真犬豕之不若，盜賊所不屑為者矣。⁵³

劉聲木不多加批判，亦認為共產黨有害綱常與國家，壓制有理。張作霖之所以能為「綠林魁首」，其因在此。連盜賊都知曉的道理，為何清末皇帝無法理解？

也就是說，劉聲木認為盛世、季世的差異，在於社會風氣是否注重程朱綱常。他說：

國朝醇儒，首推陸清獻公隴其，卒從祀孔子廟廷【庭】，其言行足法，似毫無疑矣。平生排擊陽明，猶可說專宗朱子，不如是，後人不能謂之道氣嶽嶽也。至謂明之亡，不亡於寇盜，不亡於朋黨，而亡於學術，詆太史公為陋，韓昌黎為恥，淵明、太白為酒酒，是何言也！⁵⁴

陸隴其（1630-1692）斥王崇朱，正也顯示著清朝龍興。相較來說，晚明王學盛行，使得國家衰敗，此害更甚於盜寇、朋黨。所以，劉聲木又進一步批評道：

明季遭屠隆、桑悅、陳繼儒、祝允明、李贄、鍾惺、譚元春等狂徒，直欲蔑棄先王倫常，變更禽獸習慣。其流毒天

⁵³ 劉聲木，《莢楚齋三筆》，卷4，〈張作霖演說語〉，頁550。其摘抄的演說語內容如下：「我的學堂，根本要講道德，讀孔子的書，從倫常上做起。像共產非孝這種學說，到我東三省，是要槍斃的。我平日對於家庭，純是專制，惟我獨尊。若家庭不能統一，還能治一省麼。我的兒子，現在已當了旅長，見了我，氣都不敢出。他對我說話，要先看我的顏色，若我顏色不對，他就不敢開口。什麼平等自由，還早著咧。」

⁵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隨筆》，卷5，〈論陸隴其〉，頁89。

下，深入人心，以致禍亂相尋，明社以屋。其流毒比之張獻忠、李自成，奚啻千萬倍。不待張李作亂，明季之人心亡久矣，雖欲天下不亡，得乎！⁵⁵

陽明後學藉由講會組織同好，平衡過於強調主觀道德的流弊，以期能經世濟用，而對時政有所批評。⁵⁶然而，劉聲木似忽略陽明後學的努力，反倒以腐蝕人心論之，卻又未能具體指出何謂「流毒」、「心亡」，並視為明清易代的原因。就此看來，劉聲木藉由批評陽明後學，論證程朱倫常與朝代興衰相關，不免流於武斷。

另外，晚明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，亦無助於重整綱常，據《四庫提要》評論：

初，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，士大夫喜其博辯，翕然趨附，而之藻與徐光啟信之尤篤。其書多二人所傳錄，因裒為此集。……西學所長在於測算，其短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。所謂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動之細，無一非天主所手造，悠謬姑不深辨。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，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，悖亂綱常，莫斯為甚，豈可行於中國者哉！⁵⁷

西學擅長測量計算，但缺點在於崇奉天主迷惑人心。先不論「造物者」的謬誤，光以「天主」凌駕父母君臣關係，即是悖亂。因此，李之藻（1571-1630）與徐光啟（1562-1633）可謂綱常的敵人。而

⁵⁵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論程羽文鴛鴦牒〉，頁71。

⁵⁶ 呂妙芬，〈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17：1（臺北：1999.6），頁79-104。

⁵⁷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134，〈天學初函〉，頁11a。

晚清西學東漸更盛於晚明，傳教活動亦更為活躍。劉聲木曾在 1912 年於青島與德國傳教士尉禮賢（Richard Wilhelm, 1873-1930）會面。據他記載：

禮賢研究中國學術極深，中語亦至為嫻熟。並極言孔教平正，盡人可奉，不似他教各有所偏，均有流弊。予於壬子四月，在青島親見之，問以耶穌教何如。尉云：「耶穌教亦有偏處，遠不如孔教，較勝於天主教。」其言尤為篤實不欺，不愧我國君子之行。⁵⁸

劉聲木藉此證明，中國傳統「孔教」優於西洋宗教，不僅是不爭的事實，更是普世價值。不過，尉禮賢為何如此認為？依傳教士立場來說，理應宣揚自身皈依宗教之優越處，或盡可能說服中國人信教。假如尉禮賢真的認為「孔教」優於西洋宗教，那麼具體優越之處為何？劉聲木又未詳細記載。換句話說，劉聲木與尉禮賢會面的對話，不僅顯得空泛，更可懷疑其真實性。也由此可見，劉聲木藉由創造故事情節，加強其申論之說服力。

在帝制中國末期，清廷為穩固情勢，曾大力研議從祀孔廟問題，並藉儒教確立政權正當性，增強國內向心力。1905 年，雖然廢除科舉，但清廷仍規定儒家經典為新式學堂的必修課程。然而，民國建立之後，儒教失去政治力量支持，無法繼續成為壟斷道德價值的觀念。此時的知識分子蔡元培（1868-1940）認為，孔子與後世形成的孔教或儒教應當分開談論，所以帶有國教意義的「尊孔」與「信教自由」相牴觸，不得再為國民教育的原則，且「忠君」

⁵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隨筆》，卷 4，〈泰西教士穆尼閣二人〉，頁 73。

更非共和精神。另一方面，若強調「孔教」是宗教，那麼本身是否帶有迷信的特質？結果導致「儒教」、「孔教」不再被廣泛重視，曾經遍佈中國的「孔教會」亦日漸消逝。⁵⁹

根據劉聲木與尉禮賢的談話，可以推測劉氏已接受「孔教」一詞，也可能接受「孔教會」，但也可能並未瞭解或不關注「儒」、「孔教」的差異。與此相較，劉聲木或許更介意「外來宗教」所造成的危害，他說：

文毅【指魏裔介】學宗朱子，詩文亦醇雅，不失為儒者之言。……即《四庫提要》，於文毅亦無貶詞，似可為完人矣。孰知其生平夙奉天主教，列名氏於上海徐家匯天主堂中。當時致天主教神甫書札甚多，皆藏於天主堂藏書樓中，備言奉天主教原委，實為文毅極大羞辱。此事當時竟未有知之者，直至光緒年間，始發見此事。雖信教可以自由，國朝末造始有此說，然奉教者，仍屬無知莠民，在文毅當時，不能以此自解。何況文毅以理學名臣身負重望，更不當棄其祖宗不祀，以祀天主。明末徐文定公光啟，雖亦以大臣崇奉異教，然文定並不以理學自囿，猶可說也，然《四庫提要》已深惡痛絕，斥責不遺餘力。若文毅內懷奸宄，外昭理學，真小人之尤，罪不容誅者也。⁶⁰

魏裔介（1616-1686）學宗朱子，信奉天主教，但直至光緒年間才為人所知，所以《四庫提要》並無加以批評。身為理學名臣的

⁵⁹ 陳熙遠，〈孔·教·會——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〉，文收林富士主編，《中國史新論：宗教史分冊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0），頁511-540。

⁶⁰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隨筆》，卷5，〈論魏裔介奉天主教〉，頁89-90。

魏裔介，棄祖先而崇信異教，等同違背綱常，也就成了「內懷奸宄，外昭理學」，名實不符的「真小人」，不容寬貸。因為「真小人」不被《四庫提要》批評，所以特此申論，而徐光啟已被批判，故不再多論。就此看來，劉聲木此論目的在於補足《四庫提要》尚未申明者，並無為徐光啟翻案的意圖。由上可知，劉聲木對天主教並非持正面態度，再根據前引史料「然奉教者，仍屬無知莠民」，此種刻板印象充分顯示其鄙視的眼光。清末提倡信仰自由，不僅無益於維持上下秩序，還吸引不少「莠民」信仰天主教，更加快亡國的腳步。簡言之，劉聲木認為無益於程朱之道者，如天主教及陽明學，即是有害於綱常，流毒後世。

但劉聲木認為此「毒」並不始於晚明，更可上溯至靖難之役。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明太祖（1328-1398）駕崩，朱允炆（1377-1402？）即位，起用文臣推行「建文改制」。因諸王尾大不掉之勢，有威脅皇權的顧慮，所以建文帝採納齊泰（?-1402）、黃子澄（1350-1402）建議進行「削藩」，卻因此激起燕王朱棣（1360-1424）出兵「靖難」。

朱棣即位後，除了嘗試「革除」建文之外，更致力於塑造正統，藉由詆毀建文而自我合理化。但建文帝及忠臣傳說並未因此消逝，反倒頑強地流存於民間，成為後世評論歷史的養分。⁶¹明清之際，靖難成為遺民語境中亡國遠因，並進一步藉此自我述說：不僅透過批評永樂帝來表達不滿，亦利用方孝孺（1357-1402）遭誅來抒發不從清朝的志向。⁶²時至民國，方孝孺成為清遺民劉聲木的榜樣，他說：

明之方孝孺，死於燕王棣靖難之役，身遭磔死，夷及十族，

⁶¹ 何幸真，《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，2013）。

⁶² 趙園，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，頁141-152。

其忠魂義魄，堪與日月爭光，龍逢、比干爭烈，震耀萬世，自不待言矣。……然後人重其忠烈，幾於無人不知有方孝孺，無家不藏有《遜志齋集》，忠孝何嘗負於人哉！孝孺詩文，當時雖遭成祖禁錮，至宣德後，即稍傳於世。……永樂距今時僅五六百年，以無一人誦習之集而已八易板，其為人所重視如此。集以人重，豈非忠烈之效哉！⁶³

劉聲木雖認為方孝孺過於拘泥於古制，⁶⁴但瑕不掩瑜，聲名仍因方氏之忠烈而不墜，使《遜志齋集》能突破明成祖的禁網，至宣德後「復出」。而對劉聲木來說，清朝禁燬書籍是維持綱常的方式，但明成祖禁方孝孺文集卻隱有「邪不勝正」的盼望。

另外，劉聲木亦藉建文傳說中的「徐妙錦」抒發遺民之志。關於「徐妙錦」，據查慎行（1650-1727）《人海記》記載：

徐中山第三女名妙錦，文皇欲娶為繼后，女不可，因不嫁而為尼。嘗論革除事：建文君當坐殿上，燕王至，苟不讓則死，何必自焚竄。每語遜國事，未嘗不痛哭也。⁶⁵

劉聲木摘抄此段後，進一步申論：

據此，則徐中山三女知君臣之義，明順逆之理，身為弱女子，不獲有為，因薄視成祖，寧犧牲后位，自願為尼，以

⁶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葦楚齋隨筆》，卷3，〈方孝孺遜志齋集刊本〉，頁46。

⁶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葦楚齋隨筆》，卷4，〈論方孝孺〉，頁82。

⁶⁵ 查慎行，《人海記》（清光緒正覺樓叢刻本），卷上，〈徐妙錦〉，頁35b。

安淡泊。其識見高出靖難諸臣之上，洵千古一人也！⁶⁶

劉聲木因徐妙錦削髮為尼，而讚其為「千古一人也」。然而，此事正史並無相關記載。《明史·徐達傳》載徐達長女為文皇帝后，二女為代王妃，三女為安王妃。⁶⁷另據《明史·安王傳》載：

安惠王楹，太祖第二十二子。洪武二十四年封。永樂六年就藩平涼。十五年薨。無子，封除。⁶⁸

受封、就藩橫跨靖難，可知安王楹未受此事影響。另據《明太宗實錄》的記載，明成祖於安王楹薨時，「輟視朝五日，謚曰惠，賜祭命有司治喪葬，皇太子親王皆遣祭王。」⁶⁹由此可推估安王楹並未與明成祖為敵，而徐達第三女安王妃亦無削髮為尼的可能。另外，《四庫提要》曾考證「徐妙錦」，據載：

考「中書徐妙錦」一條，佐集【指黃佐《革除遺事》】載之，題曰《徐妙錦傳》，然則佐亦潤色其間矣。朱彝尊嘗謂黃佐《革除遺事》與當時紀建文事諸書，皆不免惑於《從亡》、《致身》二錄。蓋於虛傳妄語，猶未能盡加芟削云。⁷⁰

⁶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三筆》，卷9，〈明徐達三女不嫁〉，頁660。

⁶⁷ 張廷玉等，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，中華書局點校本），卷125，〈徐達〉，頁3730。

⁶⁸ 張廷玉等，《明史》，卷118，〈安惠王楹〉，頁3607。

⁶⁹ 楊士奇等纂，《明太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），卷192，〈永樂十五年八月至九月丙子條·安王楹薨訃文〉，頁6。

⁷⁰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53，〈革除遺事〉，頁29ab。

綜合上述，查慎行《人海記》之說應為野史傳聞。而將《四庫提要》視為「讀書門徑」的劉聲木，可能為了抒發其情志而選擇採信查慎行《人海記》的紀錄。

儘管靖難之際不乏忠義傳說，但最終仍不敵起兵奪位的朱棣。有功於朱棣的姚廣孝(1335-1418)，在劉聲木眼裡則為助紂為虐、利欲薰心之徒，他論道：

世人但知明姚廣孝起自緇流，佐成祖以得天下，而不知元劉秉忠亦起自緇流，佐元世祖受命。姚廣孝之佐成祖，以篡取侄位，原為利祿而起，無道德之可言。其後官居極品，位極人臣，終身不易僧服，亦惡人中異人也。⁷¹

劉秉忠(1216-1274)，初名侃，字仲晦，其祖曾仕於遼朝，於曾祖時為金朝邢州節度副使。至元十七年(1280)，木華黎取邢州，以其父劉潤為都統，後改任署州錄事。劉秉忠認為「吾家累世衣冠，乃汨沒為刀筆吏乎！」因此感到時運不濟，入山皈依佛門為釋子聰。後隨海雲禪師入潛邸，並助元世祖治國取天下。⁷²姚廣孝同樣為佛門中人，卻助明成祖奪位。劉聲木以劉秉忠作為對照，強調姚廣孝之惡甚鉅，遺害後世，他說：

明僧道衍即姚廣孝，燕王棣謀逆，多資其謀畫，當時毒流四海，天怒人怨無論矣。推姚廣孝之心，毒流四海，猶以為未足，復欲毒流後世，撰《道餘錄》二卷，刊入所撰《逃虛子集》中。其專詆程朱，肆行無忌，至為悍悖，喪心病

⁷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續筆》，卷3，〈僧人位至將相〉，頁301-302。

⁷² 宋濂等編，《元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，中華書局點校本），卷157，〈劉秉忠〉，頁3687。

狂，不意其一至於此。《姑蘇志》載張洪謂人曰：「道衍與我厚，今死矣，無以報之，但每見《道餘錄》，輒為焚棄。」云云。是當時雖親暱之人，且已焚其書矣。後來桑悅、屠隆、李贄、祝允明輩肆無忌憚，直欲滅絕綱常，卒致明易社為屋，皆姚廣孝階之厲，是流毒又及於後世矣。王夫之《宋論》、《讀通鑒論》，詆斥蘇文忠公不遺餘力，皆為桑悅輩而發。然蘇文忠公雖細行不檢，責以不能正心修身可矣，其狂悖不若斯之甚也。⁷³

連友人都要燬《道餘錄》，可見姚廣孝的著述不僅毫無價值，更不能流存後世。此人「喪心病狂」，為禍患根源，王夫之藉駁斥蘇軾以批評桑悅等人，然蘇軾又不如滅綱常者狂悖，可見此等罪大惡極。此後倡「直欲滅絕綱常」者，皆受其「遺毒」所影響，為明代滅亡的禍首，使得國變之際，心無廟堂社稷者眾，僅為個人苟活，就如吳三桂（1612-1678）輕易肩繫白布出降。辛亥時，軍警亦如此，此狀令劉聲木嗟歎。⁷⁴

綜合上述，劉聲木因姚廣孝幫助燕王奪位，視為謀逆，晚明陽明學「絕綱常」即同處一脈，與近年主張維新者相類。而「專詆程朱」被視為悖亂，可知程朱是相對於陽明的存在。換句話說，劉聲木認為綱常是一切秩序的基礎，國家不可偏廢，而程朱因有助於此，故處正端。陽明學因提倡「絕綱常」，故可謂罪惡淵藪，則處負端。而正負兩者傾軋，盛季二世因此循環。

⁷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萇楚齋隨筆》，卷9，〈明僧道衍道餘錄〉，頁183。

⁷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萇楚齋續筆》，卷8，〈白布迎降〉，頁404。

四、彰顯倫常：人物的讚揚與批評

忠義者捨偷生之私欲，不僅是為求保國，更是合於綱常。另一方面，劉聲木將變亂干戈殉節情事寫至書中，不僅為求保留文獻，更能藉宣揚以整世風。不過，殉節者可為綱常的「最佳代言人」，而劫後餘生者，如劉聲木等人，該如何自處？或可如黃錫朋，成為新時代的遺民。劉聲木說：

黃錫朋字百我，都昌人，光緒癸巳舉人，官度支部主事，宣統辛亥，乞假南歸。撰有《皇鳥山樵隱詩鈔》四卷、《蟄廬文略》二卷，己未孟冬刊本。詩集自三卷以下，多黍離麥秀之音，文集中《重修宗譜序》，自言有採薇之志。壬子八月，與某君書，自言：「作故國遺民以沒世，則至榮之幸也。」復友人書，亦自言：「至於鄙人，備員郎署已逾八年，必無改操易節之理。」《復胡伯宜書》，自言：「國變後，以漆室女自處，誓不再嫁。」云云。可謂志節皎然，不為勢利所誘，為清末完人。⁷⁵

辛亥前，黃錫朋居位逾八年。辛亥間，無改節操，為「故國遺民」存於世，劉聲木稱其為「清末完人」。同樣被劉聲木稱為完人的遺民，有無錫人王世忠：辛亥後，選擇身著黃冠道服避世，絕口不談時事。⁷⁶也就是說，劉聲木認為，清室崩潰後仍能保持節操、不謀利祿，無論是否殉節，皆為「完人」。而若大節無虧，存留於民國並專心著述，亦屬「完人」之列，如陳伯陶（1858-1930），

⁷⁵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續筆》，卷1，〈黃錫朋遺民〉，頁253。

⁷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隨筆》，卷8，〈王世忠等清末完人〉，頁173。

辛亥以後避居九龍，絕應酬而專心修《東莞縣志》。

《東莞縣志》經兩次修纂，皆出於遺民之手。陳伯陶序言提及，遺民懼勝朝舊聞散佚，故著述保存。劉聲木期望能藉由書記陳氏事蹟，使之流傳不朽。⁷⁷就此來看，保存滿清故事的趙爾巽（1844-1927）接掌清史館，亦不算是變節。然而，清史館並未受到廣泛支持與注意，遺民的態度亦有落差。

除了遺民之間私人恩怨以及對實際撰寫的不滿之外，清史館是由袁世凱出資開設。民國三年（1914），袁世凱設館修清史，就如清朝修明史，有延攬勝朝遺老之意，也使自己免於篡謀政權的罵名。對於趙爾巽等支持《清史稿》的人而言，此為報故國恩的機會。⁷⁸但對其他清遺民而言，如此是否即為「貳臣」？劉聲木謂：

予少以頑劣，見擯於師友。光緒乙未，年已十八，負笈於江都徐蟄叟廣文師之門。受業月餘，以《木蘭從軍》為試帖課題……師見之尤為嗟異，更以「堅忍勤靜」四字許我。嗣後教以讀書為人之道，所以獎勵激勸者十年之久，深沐時雨春風之化。今已年逾五十，窮愁潦倒，落拓無成，愧負吾師期許，然回思往事，真生平第一知己。昔新城王文簡公士禎之於常熟錢牧齋尚書謙益，建寧朱梅崖廣文仕琇之於□□李廉衣孝廉□□皆常自稱為生平第一知己。聲木雖寒劣卑陋，萬不敢望王朱項背，然平生亦略有撰述……果使後人以所纂輯不詭於正，可備參考，許其附驥以傳，使微賤名氏，千載下得挂名於藝林之末，如江陰繆筱珊京

⁷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三筆》，卷8，〈遺民修東莞縣志〉，頁639。

⁷⁸ 林志宏，《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），頁123-127。

卿荃孫所云，則不特予心已大慰，或亦不致有負吾師知人之明耳。⁷⁹

雖然未能得知曾任總纂的繆荃孫與劉聲木實際交流情形，但至少可知劉聲木不厭惡、也不批判，甚至相當尊崇繆荃孫。不過，將繆荃孫與錢謙益並列，或許已暗示劉聲木對繆氏的評價：貳臣史官。以曲折方式表露態度，或許是因為劉聲木雖不認同失節，若如部分遺民抱持「清室未亡」的想法而不修史，⁸⁰那清朝文獻與故事恐就此散佚。再者，由劉聲木對張勳復辟事不置一詞，以及對清末民初殉節與遺民的重視，可見其認為帝制不合潮流，已接受「中華民國」存在的事實，⁸¹故修史具有正當性。換句話說，是否領中華民國俸祿修史，不比保存前清文獻故事來得重要。或許他已清楚體認到時代遞嬗，但基於符合人世綱常的立場與理由，仍選擇隱而不出。

然而，《清史稿》的修纂過程並不順利。袁世凱死後，清史館頓失財源，趙爾巽不得不向軍閥求助。其中，包含允諾資助《清史稿》印行的「綠林魁首」張作霖。儘管解決一時之需，但後續仍不如劉聲木所期望的順利。除了傳統史學備受挑戰之外，《清史稿》的命運仍然多舛，在1928年春印刷1100部之後，被北上的國民政府查禁。查禁前，金梁曾運出40部，因此《清史稿》流通不廣，甚至被新史家視為「官樣文章」重現，故不被重視。然而，《清史稿》對遺民來說，卻是故國記憶的留存。⁸²

此外，清遺民亦著書立說，藉歷史自我抒發，如劉聲木筆下

⁷⁹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三筆》，卷4，〈聲木第一知己〉，頁544-545。

⁸⁰ 林志宏，《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，頁125。

⁸¹ 吳志鏗，〈清遺民的晚清記憶——劉聲木的個案研究〉，頁315-353。

⁸² 林志宏，《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，頁129-130。

的張其淦（1859-1946）：

駢文前【指張其淦《松柏山房駢體文鈔》】復有□□章一山太史稷序云：「宣統三年，以臣欺君，遂改國體，迄今十有六年，亂日以熾，而聖道因以日晦。當其時，巧辭詭說，無識者靡然從之。其明乎君臣大義者，率匿處四方，不問世事。上海，遺臣退士之所僦居也。故宮禾黍之思，荊棘銅駝之泣，人孰無之。」云云。可謂慨乎其言之。學使以「松柏」名齋，又撰《明代千遺民詩詠》三編以見志，深得方伯同保歲寒之旨。天地間正氣，徑鍾於東莞一隅矣，異哉！⁸³

宣統辛亥改國體，聖道不彰，巧言令色者風行。真正心懷君臣大義者，多僦居於上海，懷思故國，不問世事。另外，張其淦更撰《明代千遺民詩詠》，藉明遺詩詠以明志。張其淦如此，劉聲木亦然。劉聲木曾編《國朝悼亡詩輯》，後因倦乏而停止，故目前無全本。不過，仍將《國朝悼亡詩輯·凡例》輯於書中，自述其編輯動機：屢懷悼亡之痛，將哀愁寄於詩。⁸⁴所收詩人之中，顧炎武最為特別。

顧炎武、王夫之、黃宗羲被晚清時人合稱清初三大儒，更有奏請從祀文廟，然而意見分歧。不過，繆荃孫《國史儒林傳》目錄，已將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提升至儒宗的地位。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御史趙啟霖（1859-1935）上奏，再次掀起朝議，直至

⁸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莒楚齋四筆》，卷10，〈張其淦撰述〉，頁881-882。

⁸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莒楚齋五筆》，卷8，〈國朝悼亡詩輯凡例〉，頁1036-1037。

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顧、王、黃才獲得官方認定的三大儒地位。⁸⁵其中，顧炎武因心懷前朝，受廷議顧慮。

陸心源（1838-1894）認為，曾抗清的黃道周（1585-1646）、孫奇逢（1585-1675）皆已入祀，且《四庫全書》所收著作甚多，《國史儒林傳》更將之列於諸儒之首。光緒十年（1884）陳寶琛（1848-1935）則以學術的角度，認為顧黃二人家傳忠孝，且學兼漢宋，著作豐厚，但李鴻章（1823-1901）等人反對，認為黃宗羲有門戶餘風，考據亦不確實；顧炎武之說過迂難行。兩人從祀文廟無庸議，而建議二人入祀鄉賢。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內閣再議，認為《四庫提要》曾駁顧黃之學，表示學術價值有待商榷。章樞（1861-1949）則從排滿問題著手，認為人臣各為其主。⁸⁶不同於廷議與輿論的沸沸揚揚，劉聲木則沈浸於黍離之思中。

劉聲木此時不再利用《四庫提要》抒發遺民情懷，而是直接閱讀顧炎武著作。劉聲木讀〈悼亡〉五詩，心有戚戚焉，故抄錄於《萇楚齋三筆》，以資諷詠。顧炎武除了悼念亡妻，更直書「遺民猶有一人存」以明志。⁸⁷而顧炎武的謁陵，更引起劉聲木的注意。劉聲木說：

昔顧亭林先生當滄桑之際，七謁孝陵，六謁天壽山攢宮，耿耿孤忠，千秋共仰。比者梁君節庵，崇陵種樹，獨居三年然後歸，猶復每值有事之辰，必往展禮，今之亭林，何

⁸⁵ 何冠彪，〈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——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明清人物與著述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6），頁49-63。

⁸⁶ 何冠彪，〈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明清人物與著述》，頁67-86。

⁸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萇楚齋三筆》，卷1，〈顧炎武悼亡詩〉，頁488。

多讓焉。……聲木謹案：歷代以來，每當國家陽九百六之時，必至風俗頹壞，人心變幻，莫可救藥。始至【致使】生民塗炭，流離顛沛，困苦備嘗，無所控訴。乃天為眾生示之警罰，非僅降禍福於一人一家已也，必至人心厭亂，天心始厭亂也。然禮義廉恥，必有人為之撥亂反正，上契天心，始克久安長治。然吾謂亭林先生等，即其人矣。⁸⁸

康熙皇帝曾多次親自謁陵，並以「治隆唐宋」讚賞太祖，不僅安撫漢人，亦給予歷史評價。但對於明遺民而言，則是藉此抒發故國情懷。⁸⁹也就是說，「謁陵」不僅是官方統治的手段，亦是遺民的心靈寄託，就如同1928年出版的《清史稿》。而顧炎武七次謁孝陵、六次謁天壽山及崇禎攢宮，次數之多，顯示其忠於明朝之心，亦為禮義廉恥重整之人。而顧炎武的謁陵，就如梁鼎芬（號節庵，1859-1919）祭祀清德宗陵寢。⁹⁰

梁鼎芬曾於袁世凱死後，積極參與復辟。實際上，民初士人對復辟的看法相當複雜。惲毓鼎（1862-1917）認為，其原因在於民國橫征暴斂及袁世凱失信。熊希齡（1870-1937）則認為，民國待清室甚厚，倡導復辟者實為陷宣統帝於不義。然而，復辟的失敗，不僅侵害清室權益，更使清遺民名聲一落千丈。⁹¹劉聲木雖稱讚梁鼎芬如顧炎武，但並未響應復辟，故可懷疑劉氏求自保。

另外，顧炎武曾有與友人詩詠，劉聲木讀後論道：

⁸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四筆》，卷3，〈顧炎武等謁陵〉，頁733。

⁸⁹ 朱鴻，〈情繫鍾山：清代皇帝及士人拜謁明孝陵的活動〉，收於朱鴻林主編，《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345-370。

⁹⁰ 林志宏，〈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〉，頁94。

⁹¹ 林志宏，〈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〉，頁106-114。

先生當時目見明季遺民出仕國朝者日多，感憤而作此詩，以為箴規，其不欲獨善其身之旨，已於言外見之。其志趣何其高潔，真如鸞鳳翔於千仞，固非凡鳥所得攀躋也。⁹²

儘管明人仕清者漸多，但顧炎武仍堅持不出，且更有亡國不亡天下之論：漢文化道統載於遺民而存續於新朝。⁹³可惜的是，顧炎武雖孜孜著述，但其著作散佚甚多。⁹⁴

只要堅守綱常禮教，即為忠臣。而顧炎武無忝所生，其母王氏曾告誡「無仕異代」，並於甲申時絕粒殉節，可謂「彤史中，真千古第一人也」。⁹⁵因此，劉聲木認為顧炎武是遺民最佳典範，足以讚揚其行。再加上前章所述，無論殉節與否，行事符合忠孝節義最為首要。

顧炎武行為展現故國之思，劉聲木認為符合道德，並與其相比擬。而遺民的黍離悲痛，不僅表現於詩歌與謁陵，亦展現於史論，劉聲木謂：

論史之書，前人著述，皆零星小種，大部頭書，首推南宋胡寅《讀史管見》三十卷。雖屢經《四庫提要》駁斥，人人責以周孔，未免太過，終為史論中一大觀。致堂先生生當南宋，正值聖教凌夷，倫常乖舛，人心變幻，忠佞混淆，目擊心傷，痛切言之，不覺大聲疾呼，主持太過。紀文達

⁹²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五筆》，卷4，〈顧炎武欲人同作遺民〉，頁958。

⁹³ 何冠彪，〈論明遺民之出處〉，頁67。

⁹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續筆》，卷7，〈顧炎武遺佚撰述〉，頁386-387。

⁹⁵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莢楚齋隨筆》，卷1，〈顧亭林母王氏殉明難〉，頁5。

公昀，生當我朝全盛之時，聲明文物，倫敦綱常，正修明之時，自覺其言之太苛。聲木生逢季世，較之致堂所處之時，又有霄壤之別，頗覺其論愜理饜心，言之非過，讀之有餘痛焉。……國朝王夫之撰《讀通鑒論》三十卷、《宋論》十五卷，沙張白撰《讀史大略》六十卷。張文襄公之洞《勸學篇》稱：王氏史論，語好翻案，意多獨斷。聲木私謂：千古史論大書，終當以王氏為冠。其議論精微確鑿，實能開拓千古心思，推倒一時豪傑，絕非他人枝枝節節所可比擬。《宋論》尤為精確，借宋論明，言之至為沉痛，鏤心鐫肝，更非他人所能道其只字。其文筆縱橫排宕，無孔不入，無堅不摧，無理不透，其魄力全由韓蘇得來。即此史論，已足獨立千古矣。⁹⁶

本文前引劉聲木藉《四庫提要》對王安石的評斷，而此則與之相違。《四庫提要》對《讀史管見》的批評，在於「不近人情，不揆事勢，卒至於窒礙而難行」，⁹⁷就如聲木上述的「未免太過」。但因為紀昀生於大清盛世，胡寅（1098-1156）則存於南宋季世。盛世處事謙和寬大，但季世因倫常崩壞，故需疾呼周孔，以重整秩序。所以，處於季世的劉聲木認為，此為剴切陳詞，並無過當。同樣地，王夫之史論並非如張之洞所言「語好翻案，意多獨斷」。而劉聲木認為王夫之擅於歸納史實，並視王氏為千古史論之冠。⁹⁸

王夫之認為天下秩序治亂相繼：治世有君，道德嚴明，政統

⁹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2，〈論論史各書〉，頁23。

⁹⁷ 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89，〈讀史管見〉，頁4b-6a。

⁹⁸ 杜維運認為，王夫之可謂駁斥西人「中國無歷史解釋之藝術」的一例。詳參杜維運，《清代史學與史家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3），頁48-58。

相傳，且治世之君並不繼亂。朝代末造，君王權威衰微遂成亂世。⁹⁹王夫之又加以申論：

國政之因革，一張一弛而已。風俗之變遷，一質一文而已。上欲改政而下爭之，爭之而固不勝；下欲改俗而可抑之，抑之而愈激以流；故節宣而得其平者，未易易也。……聖王不作，禮崩樂壞，政暴法煩，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已矣。¹⁰⁰

若君王未能伸張權威，不整禮樂，則政繁無益，此景就如晚清。在劉聲木眼裡，清末新政不僅成效不佳，所用非人，無法使國家奮進，反倒使綱常經緯潰敗。此外，光緒又非聖王，舉措失宜。因此，劉聲木認為，光緒與新政使國家邁向滅亡。¹⁰¹

孔儒之道猶如國本，清室卻自毀長城，導致民心渙散。王夫之「藉宋論明」書成《宋論》，而劉聲木則以《宋論》評清。不過，王夫之夷夏大防的立場鮮明，¹⁰²劉聲木不僅未置一詞，甚至更有意「失焦」，他說：

王船山先生《宋論》末段有云：「漢唐之亡，皆自亡也。宋亡，則舉黃帝、堯、舜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。」云云。吾觀國朝之易社為屋，何以異是。其初因篡盜，不能不滅絕倫常，以示天下，然猶尚知尊孔也，其後又廢孔矣。孔之興廢，非一人一家所得紊亂，暫時之廢，與厄於

⁹⁹ 王夫之，《讀通鑑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），卷22，頁688。

¹⁰⁰ 王夫之，《讀通鑑論》，卷22，頁283-284。

¹⁰¹ 吳志鏗，〈清遺民的晚清記憶——劉聲木的個案研究〉，頁322-341。

¹⁰² 何冠彪，〈論明遺民之出處〉，頁77-81。

陳蔡等耳。當外示尊孔子時，京師孔廟，尚懸一扁一聯。扁文云「萬世師表」。聯文云：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未有夫子也；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其為聖人乎。」用經語，恰合聖人身分。日本某人之孔子贊曰：「孔子以前，未有孔子。孔子以後，未有孔子。大哉孔子！」「孔子」「孔子」數語，亦說盡「大成至聖」四字。鄰國尚且尊之，我國方謀廢之，不亦異乎！¹⁰³

劉聲木認為，王夫之《宋論》末段主旨在於綱常道德興廢，又藉此評論晚清廢孔、日本尊孔。然而，王夫之《宋論》末段應指蒙古入華而「亡天下」；中國道統隨宋亡而斷絕，並藉此影射清人入關時自身的心境。若再與後續段落對照，更能顯見其鄙視北族之情，王夫之論曰：

自遼海以西，迄於夏、朔；自賀蘭以南，垂於洮、岷；其外之逐水草、工騎射、好戰樂殺、以睥睨中土者，地猶是地，人猶是族，自古迄今，豈有異哉？¹⁰⁴

無論宋元或明清，北族的本質未有改變。後又論及夷夏傾軋變化，並道出「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」。但宋代因顧忌尾大不掉，重文輕武，北防潰敗。若宋代帝王能擇人任事，那女直豈會「內蹂」？夷夏秩序焉能崩潰？¹⁰⁵

¹⁰³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，卷5，〈王夫之宋論末段〉，頁96。

¹⁰⁴ 王夫之撰，舒士彥校，《宋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），卷15，〈理宗·恭帝·端宗·祥興帝〉，頁260-261。

¹⁰⁵ 王夫之撰，舒士彥校，《宋論》，卷15，〈理宗·恭帝·端宗·祥興帝〉，頁262。

在清末反滿意識興起之時，民族認同與對立亦愈加強烈，歷史上對抗外族、宣揚國威的人物，被抬昇為民族英雄。¹⁰⁶同時，在章太炎（1868-1936）筆下的顧、王兩人，成為具有民族大義的碩儒。¹⁰⁷也就是說，顧、王二人成為革命人士及清遺民劉聲木的典範，兩者皆有其著重面向。不過，除了讚揚出處合乎綱常之輩，劉聲木亦評「進退失據」之流，如元明之際的危素（1303-1372），他說：

危素由元降明，備受明太祖之恥辱，復遭《四庫全書提要》之掎擊。本屬高才博學，久負盛名，足以垂名後世，轉因此自貶身價，殊不值得。若國初之江左三家：常熟錢牧齋尚書謙益、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孳、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，皆以才華學問，隱負東南壇坫。當時設偃蹇山林，豈不名譽益高，有光史策。乃相率迎降，或應詔即出，後雖悔恨，已無及矣。

危素，字太樸，江西金谿人，受業於吳澄、范梈門下。其雖於年少時通五經，但時運不濟，未能為世所用，故有「終年讀書空自勞」¹⁰⁸之嘆。直到至正二年（1342），危素年約四十時，受薦為經筵檢討，後受派編修宋遼金三史。¹⁰⁹危素於元朝時受薦為經筵

¹⁰⁶ 沈松橋，〈振大漢之天聲——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33（臺北：2000.6），頁77-158。

¹⁰⁷ 何冠彪，〈黃宗義、顧炎武、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——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〉，頁57-58。

¹⁰⁸ 危素，《危太樸集》，收入王德毅編，《元人文集珍本叢刊》，第7冊（臺北：新文豐，1985，景印臺大圖書館藏劉氏嘉業堂刊本），危詩卷2，〈東風行〉，頁5a。

¹⁰⁹ 宋濂，《宋文憲公全集·芝園後集》（收入四部備要，第82冊，上海：中華書

檢討，並以史官之名表列於《宋史》後。¹¹⁰元亡前四年退官，洪武二年時明太祖授其為侍講學士。明太祖使其守忠臣余闕廟，是有意為之。劉聲木認為，危素就如錢謙益、龔鼎孳（1615-1673）及吳偉業（1609-1671），皆為博學才高之人，若隱於山林，大可保全聲名，又何必出仕新朝？

除了龔鼎孳之外，劉聲木進一步論及錢謙益與吳偉業。吳偉業為崇禎四年（1631）進士，曾短暫出仕弘光朝。順治九年（1652），受薦為秘書院侍講，後於順治十三年（1656）任國子監祭酒，隔年母喪歸鄉。¹¹¹為此，吳偉業含恨而終，《四庫全書》收《梅村集》，有〈病中有感調寄賀新郎〉臨終詞。據載：

萬事催華髮。論龔生天年竟夭，高名難沒。吾病難將醫藥治，耿耿胸中熱血，待灑向西風殘月。剖卻心肝今置地，問華陀，解我腸千結。追往事，倍淒咽。故人慷慨多奇節。為當年沉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。艾炙眉頭瓜噴鼻。今日須難決絕。早患苦重來千疊。脫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錢不值何須說。人世事，幾完缺。¹¹²

吳偉業以服母喪而返鄉，將「仕清」視為平生之憾，但「脫屣妻孥非易事」。無論如何，吳偉業已失去殉節的機會。不僅自身悔恨，

局，1989年影印本），卷27，〈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公新墓碑銘〉，頁327。

¹¹⁰ 脫脫等編，《宋史》，附錄，〈進宋史表〉，頁14254、14258。

¹¹¹ 趙爾巽等纂，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，中華書局點校本），列傳271卷，〈文苑一·吳偉業〉，頁13325-13326。

¹¹² 吳偉業，《梅村集》，收入清·紀昀等總纂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312冊，卷20，頁14b-15a。

更使自己聲名狼藉，遭唱伶譏諷「姓朱的有甚虧負你」。¹¹³不過，吳偉業仕清原因為何？劉聲木解釋說：

世但知其為老母，而不知亦為妻少子幼，故偷生忍死，甘仕二姓。人生一有繫念，必不能以節烈稱。祭酒所繫念有四：官也，母也，妻也，子也，宜其不克以身殉義，得享令名。後雖悔恨屢見之詩詞，然已無及矣。¹¹⁴

吳偉業為保其家室，故不殉節，但也因此悔恨而終。不過，吳偉業《梅村集》未遭禁燬，收於《四庫全書》，後世不僅能讀之，更能瞭解其臨終抱恨，使劉聲木仍申論有本。至於名列《貳臣傳》的錢謙益，著作內容被指違礙而遭燬。¹¹⁵據劉聲木所摘抄的跋文記載：

祥符周叔昀都轉星譽，跋常熟錢牧齋尚書謙益《歷朝詩集》後云：「舊藏是集獨無序文，蓋為人所刪去，惟此本尚完好無恙。序文自云：『托始於丙戌，微簡於己丑』。時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，而牧齋謬托於淵明甲子之例，於國號紀年皆削而不書，已悖甚矣。至自六丁字之義，則曰：『金鏡未墜，珠囊重理，鴻朗莊嚴，富有日新。』蓋是時殘明遺孽，猶假號嶺越間，江浙遺民，與海上之師互為影響，

¹¹³ 徐珂，《清稗類鈔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譏諷類，〈姓朱的有甚虧負你〉，頁1542。

¹¹⁴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菰楚齋隨筆》，卷8，〈吳偉業出仕二姓原委〉，頁160-161。

¹¹⁵ 莊吉發，〈清高宗禁燬錢謙益著述考〉，文收氏著，《清史論集（三）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175-198。

故牧齋自附於孤臣逸老，想望中興，以表其故國舊君之思，真無恥之尤者也。其印章曰『鴻朗錢齡，白頭蒙叟』，鴻，大也，朗，明也，命意尤顯然可見。至自悔不能早死，而侈然以野史亭自文，欲以此求諒於後世，嗚呼，何謂也哉！」¹¹⁶

錢謙益不僅不書康熙年號，更藉印章暗顯故國之思。對此，劉聲木進一步評論說：

南宋鄭所南□□【憶翁】思肖，原名□□更名以寓思趙□□之意。自題書室，曰「本穴世界」，亦陰寓「大宋」二字。□□【所南】清風高節，接跡東籬，後之人欽仰，互古如新。尚書已改節再醺，焉能仍以所南等人隱寓字義可比，徒供後人笑罵。其晚年皈依佛家，亦自知大節已虧，欲藉此以湔釋恥辱，此所謂欲蓋彌彰，懺悔何益。¹¹⁷

劉聲木認為，錢謙益入清後，仍有故國之思。與其相對，鄭思肖（1241-1318）則高風亮節。儘管晚年皈依佛門，但焉能洗刷恥辱？既已變節，又何必如此？徒增罵名罷了。不過，錢謙益並非毫無建樹，其致力保存明代故事，撰《明史》兩百五十卷。可惜錢謙益的絳雲書樓慘遭祝融，《明史》及字畫金石私藏皆付之一炬，不知有多少世間未傳書籍就此燬滅，可謂人世之不幸。¹¹⁸

綜合上述，危素、錢謙益、吳偉業儘管三者皆進退失據，危

¹¹⁶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菰楚齋四筆》，卷2，〈論錢謙益〉，頁717。

¹¹⁷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菰楚齋四筆》，卷2，〈論錢謙益〉，頁717-718。

¹¹⁸ 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菰楚齋四筆》，卷4，〈錢謙益藏書原委〉，頁762-763。

素的情況較不能被寬宥：錢謙益藏書存史，後又歸佛欲自滌罪惡。吳偉業為持家而仕清苟活，至臨終前皆以此為恨。但危素仕元明前後兩朝，不僅無悔恨，更敢自稱「老臣」，無怪遭明太祖羞辱，身後又遭受四庫館臣的抨擊。

五、結語

1950年代，姜貴的諷刺小說《旋風》成書，書本原名為《今禱机傳》。「禱机」原是南方楚地能預知未來的神話怪獸，後來轉為似人非人的惡魔，最終成為「歷史」的代名詞。為何一個負面名詞能夠指稱「歷史」？因為其中充斥人的惡形惡狀。就如《旋風》一書，記載著許多亂臣賊子的惡跡，諷刺著共產革命帶來的混亂。¹¹⁹對於共黨崛起，劉聲木藉張作霖的演講內容，大概也視之為綱常的蠹蟲。

劉聲木雖接受清室覆滅、「中華民國」成立的事實，但其欲為新時代之遺民，選擇埋首於浩瀚古籍，找尋歷史中可供參考的名人。對他來說，顧炎武與王夫之二人的意義在於「忠於故國」，種族意識則非他所注意，或甚至有意忽略。而姚廣孝、危素二人則為他的「負面教材」，且可凸顯綱常的重要，以及忠義份子的價值。

就如明清之際士人，針對鼎革歷史進行研究，以求心理慰藉。劉聲木認為嘉慶仍是大清盛世，但至光緒改制時，顛覆舊制，造成國家走向衰亡，正如王安石變法對宋朝的影響。國家凋蔽，人心世風頹敗，忠義不講，使得「完人」難得。因此，劉聲木欲書記完人事蹟，不僅供後人景仰，亦能彰顯忠義大節，以期藉此整飭世風，但其也選擇性採信、詮釋歷史人物的事蹟與著作。

¹¹⁹ 王德威，《歷史與怪獸：歷史·暴力·敘事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，2011），頁293-299。

「完人」並不一定要殉節，亦可為遺民。同時期的遺民，可藉保存故國遺事以盡忠，或使義行繼續流傳於世。除了遺民自行編寫的《東莞縣志》等書之外，官方開館編纂的《清史稿》亦具有號召力。可惜遺民畢竟是社會少數族群，「新史學」的流行，以及後續的政治動亂，使得《清史稿》並不被時人所重。

西學東傳之際，晚清士人的「知識倉庫」不再只有傳統經典，而充斥著《瀛寰志略》、《大英國誌》等書籍，¹²⁰知識地圖擴張之際，劉聲木雖非毫無感知，但仍認為《四庫提要》是讀書門徑，也是人世綱常的載體，更是大清盛世的結晶。不過，崇文右儒的另一面卻是寓禁於徵。

清朝禁燬書籍的內容約略可歸納五種：滿漢族群意識、兵略戰術、明清易代、思想異端、淫穢。禁燬書籍規模，至《四庫全書》編輯時達到高峰。其中，館臣對作者及書籍的評論直書於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，可謂官方意志的展現。再加上清初一系列的文字獄案，激起社會的「漣漪效應」，造成民間「揣摩上意」的改、燬板。不過，具有種族意識的書籍，在道光後逐漸復出，除了顯示清朝控制能力減弱，亦代表社會思潮的轉變。¹²¹

種族意識昂揚，西方「民族國家」觀念傳入中國，傳統君臣天下觀念逐漸被揚棄。此時，「黃帝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、人人開始自稱為「炎黃子孫」，¹²²且拉抬「本國」歷史名人。¹²³對此，劉聲木並無歡欣鼓舞之感，反倒懷有黍離悲思，藉《四庫全

¹²⁰ 潘光哲，〈「知識倉庫」的建立與讀書世界的變化〉，《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），頁49-120。

¹²¹ 王汎森，〈道、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——禁書復出及其意義〉，頁605-646。

¹²² 沈松橋，〈我以我血薦軒轅——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28（臺北：1997.12），頁1-77。

¹²³ 沈松橋，〈振大漢之天聲——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〉，頁77-158。

書》探討朝代更迭的原因，並透過歷史人物抒發己志。

對劉聲木來說，能堅持程朱道德倫常，不為貳臣，並藉歷史以寬慰自我，除此之外應無所求。1929 年《菴楚齋隨筆·續筆·三筆·四筆·五筆》出版之際，劉聲木藉顧炎武〈悼亡〉之中「遺民猶有一人存」明志。耐人尋味的是，他在 1950 年出任上海文史館館員。不知此刻的劉聲木，會自視為何人？是為故國存史的繆荃孫，還是被四庫館臣抨擊的危素？

徵引書目

一、文獻史料

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。

王夫之，舒士彥校，《宋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。

王夫之，舒士彥校，《讀通鑑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。

王鍾翰校，《清史列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。

永瑤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收入清·紀昀等總纂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至5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。

危素，《危太樸集》，收入王德毅編，《元人文集珍本叢刊》，第7冊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5，景印臺大圖書館藏劉氏嘉業堂刊本。

朱熹，《詩集傳》，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。

吳偉業，《梅村集》，收入清·紀昀等總纂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312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。

宋濂，《宋文憲公全集·芝園後集》，收入四部備要，第82冊，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影印本。

宋濂等編，《元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查慎行，《人海記》，清光緒正覺樓叢刻本。

徐珂，《清稗類鈔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。

張廷玉等，《明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脫脫等編，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郭憲《漢武洞冥記》，明顧氏文房小說本。

楊士奇等纂，《明太宗實錄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。

趙爾巽等纂，《清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劉聲木撰，劉篤齡校，《菴楚齋隨筆·續筆·三筆·四筆·五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。

二、近人專書

王汎森，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——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 年二版。

王德威，《歷史與怪獸：歷史·暴力·敘事》，臺北：麥田出版，2011。

朱鴻林主編，《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0。

何幸真，《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，2013。

何冠彪，《生與死：明季士大夫的抉擇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7。

何冠彪，《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91。

何冠彪，《明清人物與著述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6。

杜維運，《清代史學與史家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3。

林志宏，《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。

林富士主編，《中國史新論：宗教史分冊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0。

莊吉發，《清史論集（三）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7。

廖隆盛，《國策貿易戰爭——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。

趙園，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二版。

劉岱總主編，《中國文化新論·思想篇二·天道與人道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2。

潘光哲，《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。

三、近人論文

王德毅，〈由宋史質談到明朝人的宋史觀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，臺北：1977.4，頁 221-234。

吳志鏗，〈清遺民的晚清記憶——劉聲木的個案研究〉，《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5，頁 315-353。

呂妙芬，〈晚明江右陽明學者的地域認同與講學風格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56，臺北：2002.5，頁 285-236。

呂妙芬，〈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17：1，臺北：1999.6，頁 79-104。

沈松橋，〈我以我血薦軒轅——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28，臺北：1997.12，頁 1-77。

沈松橋，〈振大漢之天聲——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33，臺北：2000.6，頁 77-158。

林志宏，〈清遺民的心態與處境：以劉聲木《萇楚齋隨筆》為例〉，《東吳大學歷史學報》，9，臺北：2001.3，頁 183-218。

林志宏，〈舊文物，新認同——《四庫全書》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77，臺北：2012.9，頁 61-99。

傅范維，〈從〈諭中原檄〉的傳鈔看明代華夷正統觀的轉變〉，《明代研究》，22，臺北：2014.6，頁 59-67。